



□责任编辑:黄雯靓 □美术编辑:姜 贝 □电话:0595-22500091 传真:0595-22500225 E-mail:zkb@qzwb.com

宋元泉州： 开放铸就世界海洋商贸枢纽

纵观全球贸易史,一个港口的能级高低,不仅系于天然禀赋,更取决于其制度性开放的深度与广度。宋元时期的泉州港,正是以开放胸襟与制度创新,成功铸就了其作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竞争力,为当今世界的开放合作提供了深刻的历史范本。

“苍官影里三洲路,涨海声中万国商。”宋代诗人李郢这脍炙人口的诗句,精准勾勒出古泉州港(刺桐港)的盛世图景。刺桐港被马可·波罗誉为“世界最大良港之一”,商人云集、货品堆积如山;被摩洛哥旅行家伊本·白图泰描述为“大港之一,甚至是世界最大的港口”,其崛起绝非偶然。溯源其成功密码,“开放”二字,正是驱动巨港扬帆远航、缔造枢纽能级的第一动力。



2月19日,2026泉州非遗街秀在古城举行,扮演“市舶司官员”“异域商人”的人员与观众互动。(陈起拓 摄)



泉州在宋元时期成为“东方第一大港”,屹立于石狮蚶江镇金钗山上的六胜塔见证了这段历史。(王柏峰 摄)

3 功能性开放 从“单一门户”到“集成网络”

枢纽能级的最终体现,是资源配置的广度与效率。宋元时期泉州港的开放,构建了一个高度集成的贸易网络体系。在硬件上,宋代舟师朱或在《萍洲可谈》中描述了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:“舟师识地理,夜则观星,昼则观日,阴晦则观指南针。”中国与东南亚、东北亚、印度、阿拉伯以及北非各国的航线距离、日数、方位,多以泉州为基准。依托于此,泉州得以开辟通往世界的密集航线。

在软件上,形成了完整的贸易服务链。《元祐编敕》:“诸商贾许由海道往外蕃兴贩,并具人船物货名数、所诣去处,申所在州……州为验实,

牒送愿发舶州,置簿抄上,仍给公据,方听候日,许于合发舶州住舶,公据纳市舶司。”“元钞”由于信誉保值在海外通行,在国际贸易中起到了“世界货币”的功能。宋元泉州高效服务体系,使得中国产品远销海外,海外珍品亦输入中国。南宋赵汝适在《诸蕃志》中详细记载了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海外诸国及地区共58个,东北至日本、朝鲜,东南至菲律宾,南至印度尼西亚,西达非洲摩洛哥和意大利西西里岛,北达中亚及西亚,充分证明了一个以泉州为中心,连结亚、欧、非三大洲的世界海洋贸易体系。

4 历史镜鉴 开放胸襟再塑枢纽传奇

宋元泉州的辉煌,以雄辩的历史事实证明:一座港口的能级,根本上是其开放程度的函数。主动的制度设计、包容的社会氛围、高效的网络集成,共同将泉州推向了世界海洋文明的顶峰。当前,我们正致力于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,建设“海洋强国”。泉州港“涨海声中万国商”的历史启示

我们,推进泉州港航事业高质量发展,必须继承和发扬那种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,既要实现基础设施的“硬联通”,更要注重规则、标准、文化的“软联通”。唯有如此,才能在新时代的浪潮中,再次塑造引领风潮的东方大港枢纽传奇。

(刘志家)

1 制度性开放 从“被动泊位”到“主动锚地”

港口的繁荣,首在政策。“番商至必使诣广东,否则没其货。”北宋元丰五年(1082),复知泉州的陈偁请立市舶司于泉州,泉州港的飞跃始于此时。这一关键事件在《宋史·食货志》中也有明确记载:“元祐二年(1087),增置市舶司于泉州。”这一行政设置,使泉州从地方性贸易点,升级为由国家支持、依法管理的国际贸易口岸。

当然,市舶司的功能远不止征税。《宋史》对此说明:“掌番货、海舶、征榷、贸易之事,以来远人,通远物。”这表明其承担着“招徕远

人,阜通货贿”的积极职能,为海外商贾提供规范的营商环境和法律保障。南宋嘉定年间(1208—1224),“海商货至,官竟刮取,命曰‘和买’,实不给一钱。于是商舶滋少,供贡缺绝。”赵崇度(1175—1230)任提举市舶,与郡守真德秀罢和买,禁重征,“逾年,舶至三倍”。南宋《舆地纪胜》中称泉州“有蕃舶之饶,杂货山积”,可见其开放政策和市舶司管理者的实践智慧,吸引了众多商船和商品在此汇聚、中转,奠定了泉州港枢纽基石,使其“陆通闽、广,水达诸蕃”。



泉州市舶司遗址(本报资料图)

2 社会性开放 从“文化飞地”到“文明熔炉”

真正的枢纽能级,更体现在不同文明交融的深度上。泉州最令人惊叹之处,在于其社会层面的极致包容。南宋淳祐七年(1247),恩赐进士庄弥邵记载,泉州“梯航万国,此其都会始为东南巨镇……四海舶商、诸蕃琛贡皆于是乎集”。“四海舶商”带来的正是多元的族群与文化。

彼时的刺桐城,作为宋元时期与世界文明对话的窗口,是一座名副其实的“世界宗教博物馆”。现存于泉州海交馆的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印度教等大量石刻遗迹,无声地见证着这种多元共生的

奇迹。这种社会性开放,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“软环境”。元朝廷在泉州德济门外设有蕃坊(今聚宝街一带)和来远驿(主要负责接待外国贵宾),是外商主要聚居和交易地,这一城市布局至明清未变。官府设置的“蕃坊”享有相当的自治权。汪大猷知泉州时蕃商“与郡人争斗,非至折伤,皆用其国俗以牛赎罪”。外商去世后,还划定地块准许在泉州下葬,泉州出现了“靡肆杂四方之俗”。这种尊重与包容,使泉州从一个商业码头,升华为一个具有强大归属感的文明共同体,极大地增强了其吸引力与黏性。



如今的德济门遗址广场是市民游客怀古、休闲的好去处(本报资料图)



真武庙“吞海”碑是古代泉州人征服大海的见证(本报资料图)



法石一带的码头古时亦是蕃船客航汇聚之地(吴峰云 摄)

资讯

河南王城岗遗址 发现夏代水网体系

近日,河南王城岗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,夏代早期“国家工程”——大型、多级的标准化人工水网体系初露真容,为研究距今约4000年前的早期国家组织能力与都邑布局提供新材料。

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,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,由大城、小城组成,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夏文化的关键遗址,被相关专家认为与文献中记载的“禹都阳城”高度相关。

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马龙介绍,考古人员在大城新发现两条夏代早期人工沟渠,宽均为3米左右,呈南北走向,向北与宽约10米的大城北城壕连通,形成完备的给排水与空间分区系统。

“两条沟渠形制规整统一、走向笔直,角度数据高度精确,展现出严格的规划、设计与施工标准。”马龙表示,经测算,

两条沟渠土方量达数千立方米,需依靠大规模有组织的劳动力方可完成。

除城壕、沟渠外,考古人员还发现多条宽约1米的岔沟、宽约0.3米的小岔沟,共同构成一套由宽到窄、主次分明、层级清晰的综合水利网络。

“城壕作为防御屏障,既连通城外的自然河道,又可拦截山洪;两条人工沟渠作为界沟,起到连通、导流和调节水位的作用;小岔沟直接连接单体建筑或窑址,可快速排除雨水、废水,保障人居环境干燥。”马龙说。

“如此大型、规整的多级标准化人工水网,意味着在夏代早期,王城岗遗址就已具备统一的组织能力和工程技术标准,这是早期国家形态成熟的重要考古实证。”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掘项目领队杨文胜说。

目前,相关发掘及研究工作仍在进行中。(新华)